

中国艺术史话

Zhongguo yishu shihua

中国

织染艺术

下



.9

辽海出版社

1114890

织染艺术

(下册)

邢春如 编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14890

辽海出版社

六朝雕刻工艺

六朝雕刻工艺，有重大发展，以石雕最为突出，碑碣流行，佛像石窟造像兴起，分别走向书法，雕塑等专门的艺术门类，但均具有不可分割的工艺性质的美，造像碑和石雕像除宗教性外，也具有陈设欣赏的艺术价值。

石砚雕刻

随着文化的发展，石头雕砚出现。北魏有“石雕方砚”（山西大同出土）。砚面环饰联珠纹，有两个耳杯形水池。四周浮雕乐舞、骑兽、蟠龙、飞鸟、神采生动。砚底中心雕一宝装莲花，周围八朵莲花纹饰，是难得的案头工艺品。

碑碣刻石

继承传统发展出现新风格。与文字演变和书法家辈出有关，更是雕工技艺的成果。曹魏有九品，上尊号碑、受禅碑（河南临颍发现），钟繇书，承汉隶人楷。三体石经（洛阳出土），古文、小篆、隶书，均为新体。孙吴五品，九真太守谷朗碑（湖南耒阳发现），楷书温秀朴厚。晋存五品，爨宝子碑（云南曲靖发现），大亨四年（405）刻。大楷兼隶，刚健质朴南朝有碑碣、阙题、墓志多种。爨龙颜碑（云南陆凉发现），刘宋大明三年爨道庆文，楷中含隶意，“雄强茂美”称“神品”。（康有为评）。庾鹤铭（镇江出土），原焦山摩崖刻石，华阳真人撰上皇山樵书，笔势开张点划飞动，为大字之首。（黄庭坚评）。北朝石刻极盛，“北方长于碑榜”（阮元评）。有嵩高灵庙碑（登封发现），北魏太安二年

(456) 刻，为道教碑首。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洛阳发现），太和廿二年（498）孟达撰朱义章书，阳文楷体。结体偃实笔划雄阔而棱角方劲，见雕技功力。嵩显寺碑（登封发现），永平二年（509）刻。为梵刹碑首。从此造像、刻经、塔题、幢柱等始事增华流行。石门颂（陕西）永平二年摩崖刻石，王远书楷体，飞动疏宕，“为飞逸浑穆之宗”。（康有为评），（郑文公碑）（山东），永平四年郑道明书。上碑（平度发现），下碑（掖县发现），字体宽博，圆笔巧变气魄雄伟。还有论经书诗、登云峰山观海诗，笔力矫健全以神运，后氏称郑氏为北朝第一书家。另外元显镌墓志、王元彦墓志、元怀墓志等开唐楷先风。北齐泰山金刚经，经石峪摩崖刻石，楷中含隶结体自然笔法圆浑。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纵观六朝刻石，书法之美藉石工技艺得以传世，也与工艺特性融为一体。

石窟雕刻

以北方为主，主要有山西大同云岗，河南洛阳龙门，河北邯郸响堂山，新疆拜城赫色尔等地石雕造像等，数量多、规模大闻名于世。

1. 云冈石窟

北魏兴安元年开凿。和平年间（460~465），沙门统昙曜五窟为代表。早期以佛和菩萨为主体圆雕，形象肥实精力充沛，神态亲切喜悦，线条曲转表现薄衣细纹，陪衬飞天为高浮雕，形体粗壮多奇姿异态印度风。后期形象圆满中见筋骨，颜面清秀端庄温静。衣着厚实。飞天体态修长，裙带飘举生动。伎乐与装饰纹样相称。佛光火焰及图案以平面薄肉雕加阴纹刻线，有民族化迹象。“云冈大佛”，高14米余，

结跏趺坐，顶凸肉髻大耳垂肩。前额饱满鼻梁高直，眉长目展唇薄含笑，肩宽身直叠掌盘坐。斜披袈裟紧贴肩臂，衣薄纹细线条楞角有力。刀法平直洗练概括整体。是早期特色。“胁侍菩萨”十一窟外佛龕雕像，立身头戴宝冠，脸型修长面现微笑，雍容祥和。容貌服饰皆类当时人，意态逼真形象生动。后期特色。总体为粗健雄伟风格。

2.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扩大开凿，景明至正光年间（520~525）的“宾阳洞”为代表。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释迦牟尼结跏趺坐须弥座上，（吉字形长方板凳）。肉髻大耳脸型略长，眉弯半弧眼若纤月，鼻翼丰满口角上翘亲切微笑。两肩宽厚躯体魁岸，宽袖垂摆褒衣博带，衣褶层迭线条舒展，齐整中有变化。左侧侍立着摩诃迦叶，是个饱经风霜严谨持重的老者。右侧侍立着阿难陀，是个聪明睿智活泼开朗的少年。再外左为文殊“司智”，右为普贤“司理”（《华严经》），手持法器，各自立足于莲台上。菩萨面容清秀含睇微笑，手臂柔润身姿修长，博带长裙有女性体态，趋向世俗化。圆雕多用平直刀法，浮雕用圆刀雕刻，形象敦厚温和，气氛和谐愉快，风格清秀俊美，是一代典型。

石雕造像碑

继云冈、龙门开凿后兴起与泥塑并行于石窟、寺庙中。多小型精美，石料坚细，以白色和青色大理石为最出色。雕有多种形式，“千佛碑”或称“万佛碑”，通碑四面雕有排列整齐的小型佛像，程式化一，连续出现千篇一律富有装饰美。极见雕刻技术功力。“佛龕碑”前后两面分别雕出两三层佛龕，龕内雕出一佛二菩萨，或加二弟子，龕楣雕有飞天

伎乐及天幕等。“佛像碑”全碑仅雕一龕，龕内雕出一组佛像，龕下层雕出供养人和供物。供养人间有车骑随从，左右常有文字题记，南北朝最盛行。

“三世佛龕碑”（甘肃天水麦积山），麦积山石窟由北魏、西魏开凿，全部泥塑造像，造像碑、石像由外地石料雕成。集中在“万佛堂”中。三世佛龕的上下雕出两层小千佛，左右雕足踏猛狮的护法神王像，上有飞天伎乐飞舞，构成天国的环境。龕中心雕出三世佛，现世“释迦”居中坐而略高；往世“阿弥陀”与来世“弥勒”左右相对。并坐在一个须弥座上。形象温柔手势和缓，情态亲切如叙家常，造型写实体态世俗化。龕楣雕饰精致，上层七佛于小龕中，表现天国庄严。满饰璎珞，下垂锦绣天幕，场面华美。垂幕立体雕形阴线刻纹质感厚重，左右坐佛的长裙褶皱安排的也很巧妙别致。轻盈柔软如缎似绒，石质产生织品光泽，夸张了的长裙因坐势下垂簇集成美丽的弧线，形成了雕刻、绘画、图案的综合艺术效果。

石雕造像

单独或组合的圆雕佛像极多。陈列于寺庙和家庭佛堂之中，多用佛和菩萨之类。坐像多于立像，思维菩萨雕像（晋南石雕注解失国外），北周（557～580）的单独小型雕像，高约50厘米，半趺坐式，右手支颐，舒眉细目丰鼻闭唇，若在沉思，表现了内向性格，躯体丰腴而神态生动。宝冠垂带细腰长裙，衣纹服饰简洁洗练，左足垂下踏在莲花上，莲座花瓣肥润，雕刻手法富于装饰美。刀锋犀利明快，是小型雕像的优秀典型，秀骨清像之中已有丰润之态，上承北魏淳朴之美，下启隋唐丰腴之风。

浮雕图案

藻绘边饰，以莲花、卷草为最出色。窟室装饰（龙门宾阳洞），穹窿窟顶中部藻井为一重瓣莲花，围绕流苏构成莲花宝盖，四周8个伎乐天和2个供养天围绕莲花飞舞。裙带当风天衣飞动，弹琴奏乐体现了“诸方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地面亦饰以莲花图案，宛若铺饰“地毯”。上下呼应和谐统一。宝莲藻井（龙门莲花洞），北魏孝昌年间（525~527）雕凿，窟顶藻井有一朵精美的高浮雕大莲花。莲花是佛教的象征。之所以崇拜，花色香气之外出污泥而不染有洁净之意，极乐世界为成正果者所居。浮雕为高低三个层次。莲蓬突出，圆周曲线轮形，蓬面中心阴刻一个圆环，由周三重环带。第二层以莲心向四周放射展开双重莲瓣，特意加了个凸起的多方连续“忍冬纹”组成圆盘，烘托映衬突出了莲花形象，又同莲花浑然一体，有王莲大叶的意态。第三层即外围饰有六个供养人，衣带飘举的风姿与盛开的莲花动静相生。使富丽典雅的宝莲花生机盎然。整体看是一个典型的单独纹样的综合构成，简洁、大方、圆满、华美，是石窟艺术中莲花装饰的杰出之作。

卷草纹饰（邯郸响堂山），响堂山石窟，东魏武定五年（597）前开凿。其中图案装饰相当出色。“浮雕卷草纹”可为代表。石窟边饰浮雕，以枝蔓构成二方连续的卷曲状，主要由叶子组成。叶子变化丰富形式多样。有两种骨架构成：一是心形正反连环式二方连续，中填忍冬纹，叶形似花，正面的五出，侧面的三出瓣形叶；一是之形波状伸延连续，间出卷曲小枝，间以散叶点缀，是当时流行的植物纹典型样式。有的还在太空隙中填以各种伎乐天，衣带飞舞生动活

泼。还有的填以莲花，正、反倾侧，复瓣、多瓣，纹样变化丰富优美。这类卷草纹还应用在佛光花环火焰纹中、或石碑边侧装饰以及敦煌壁画边饰和藻井中，为唐草纹前奏。

墓葬雕刻

有墓志铭、画像石见于“石祠”、“石墓”、“石棺”。另有“陵墓石兽”等多种。

1. 画像石

北魏宁懋祠画像石（洛阳北邙山出土），内、外壁绘刻墓主生活和孝子故事画像共九组，为阴刻线画。人物准确自然，树石屋宇等配置得当（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画像石棺”有阴刻和减地兼阴线两类。北魏升仙石棺（洛阳瀍河出土），前档门扉两侧刻按剑门吏，门上刻朱雀和“莫尼宝珠”。后档刻孝子故事。左帮刻男墓主乘龙翱云升天。前有羽衣方士导引，后为乐伎仪仗，两端刻山林。右帮刻女墓主乘龙升仙，前有方士导引，后为五侍女乘鸟状神兽随行。棺底刻青龙白虎，两边各十二格刻神兽仙禽。全部画像道、释、儒相杂，三教交融。人物形象修长，构图饱满“减底”兼“阴线”刻划，有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北齐石室墓画像石（山东益都出土），武平四年造。线刻画像八件，有商旅驼运，商谈、车御饮食，交谈、象戏、出行等单幅成图，反映了与西域通商的情况及民族间的交融。北周画像石棺（陕西咸阳出土），线刻青龙白虎，伏羲女娲等，挺劲流畅为北方风格。

2. 陵墓石雕

南方突出多为“辟邪”、“天禄”。辟邪有翼而垂舌，立于墓前左方，天禄有角，立于墓前右方。形体巨大而腹下雕

空四足稳立。形象凶猛威武，虽出于想像而以象生为基础。如狮添翼，如虎生角。手法洗练而细腻，雄武中有俊秀之气，是六朝风格，梁南康简王肖续墓石兽、梁武平侯肖景墓石兽、可为代表。石柱（南京肖景墓），柱身有棱，柱顶莲花上立辟邪，挺拔秀丽。

六朝织染工艺，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织染工艺有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有红白二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的“棋局”锦，大红地或蓝色散珠团花图案的“联珠小花”锦，用紫绿、淡黄二色织成的“彩条”锦，还有“联珠孔雀纹锦”、“套环对鸟纹”锦等。这些织染品，不仅装饰华丽，而且工艺精湛。

南北朝时期，织染工艺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织物的品种和图案上，还体现在织造技术和染色工艺上。当时，织造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许多新的织造方法，如“斜织”、“提花”等。染色工艺也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许多新的染料和染色方法，如“茜红”、“靛蓝”等。这些技术的发展，为南北朝织染工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织染工艺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织物的品种和图案上，还体现在织物的质量和工艺上。当时，织物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织染品，如“棋局”锦、“联珠小花”锦等。这些织染品，不仅装饰华丽，而且工艺精湛，深受当时社会的喜爱。

南北朝时期，织染工艺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织物的品种和图案上，还体现在织物的质量和工艺上。当时，织物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织染品，如“棋局”锦、“联珠小花”锦等。这些织染品，不仅装饰华丽，而且工艺精湛，深受当时社会的喜爱。

南北朝时期，织染工艺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织物的品种和图案上，还体现在织物的质量和工艺上。当时，织物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织染品，如“棋局”锦、“联珠小花”锦等。这些织染品，不仅装饰华丽，而且工艺精湛，深受当时社会的喜爱。

五、隋唐织染雕刻工艺

隋唐染织工艺

全国的统一，疆土的开拓，交通的畅通，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市场的扩大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隋唐时期的染织工艺空前繁盛，织造技术和图案纹样均发生重大变化。在东起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越帕米尔，经中亚、西亚西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上，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精美的丝织品，集中出土在新疆吐鲁番、巴楚和甘肃敦煌3处。

隋代丝织工艺

隋代丝织品生产遍及全国，官办作坊成为高级织染品的主要生产部门。隋代的染织多出于染织署，管理制造御用染织品，生产中心为河北定州，四川蜀锦仍很发达。隋炀帝即位以后，挥霍无度，除了在外国使臣、各番酋长面前炫耀富裕，而在元宵灯会将东都洛阳八里长的御道用锦帐作为戏场，命乐人舞伎着锦绣绶帛外，又于冬日百花凋谢之季，命宫人用各色绫绮作成树叶花朵装饰宫内光秃树木。并在南巡

扬州时，用无数彩锦作为风帆装饰大型龙舟和马鞍上的障泥。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隋宫》曾这样形容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一方面反映了隋炀帝荒淫豪华生活，也说明隋代丝织品产量之大，制作之精。

隋代丝织品遗物近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均有出土，其中有红白二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的“棋局”锦，大红色黄色联珠团花图案的“联珠小花”锦，用菜绿、淡黄二色织成的“彩条”锦，还有“联珠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绮等，这些丝织品简洁质朴，别具一格。

唐代的织染工艺

唐代的织染工艺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隋末“织染署”下设 25 个“作”各有专门分工，组织庞大，生产中心由隋朝的河北定州逐渐向江南转移。除了官府的专设机构外，地主豪绅有庄园工场、城市有民间专业作场，农村还有家庭副业等。晚唐时，河北定州豪富何明远家中就有织机 500 张，俨然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手工业工场了。盛唐时期的杨贵妃，专供她一人服饰衣着，就有绣工 700 余人，没有大量丝织品的生产，是不能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的。此外，由于丝织品是唐朝主要出口商品，也需大量生产。

唐代丝织品除了丝织，还有麻、棉、毛几种，麻织品种繁多，多是劳动人民的服用品，有葛布、孔雀布、楚布等多种。唐代的棉织在我国岭南一带较为发展，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还出土有几何纹组织的丝棉交织布。此外，唐玄宗时，长安有专门出售白叠布商店。毛织产地主要分布在北

方及西北一带，生产各式毡子。江南道宣州的红线毯非常有名，诗人白居易在（红线毯）中曾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并在诗中讽刺说：“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入宫中，线原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用千两线。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此外，还有一种用羽毛织成的特殊裙子，华丽无比，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

1. 丝织

唐代丝织品名目繁多，品种丰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有绢、绫、锦、罗、纱、绮等。

绢 绢是平织的，没有花纹，用印染等方法进行装饰。

绫 绫是单色的斜纹织物，可以随时改变斜纹的组织以产生花纹，这样织造的方法称“提花”。

罗、纱 罗、纱是绞织，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的一种复杂织法，都是单色半透明的织物，以利用染色的方法进行纹样装饰。

织成锦 这种锦也是唐代高级丝织品之一，是在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通经断纬的织物，在吐鲁番曾出土织成锦条带。武则天时，曾令制织成及刺绣佛像400幅，分送各寺院及邻国，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为二宋时期发达的“缙丝”产品打下了基础。

绮 绮的织造方法，是素地起二至三枚经斜纹提花。除本色外，有染成红、黄、紫、绿等色。

锦 锦是多色的多重织法，质地厚重。唐代以前的锦称

经锦，而唐锦的制作，由于技术革新，取得了纬锦的新创造，在三国时马钧改良织机的基础上，突破了单纯经线起花织法，而且还发展到经纬线互相配合起花的新技术，这样的织法不仅可以织出更为复杂的花纹及宽幅的织物，而且色彩极为华丽，形成唐锦华丽优美的时代风格。代表作品是“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在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宝相花锦”。唐代织锦中最华丽的一种是新出现的晕绢锦，它用各种色彩相间排列，构成绚丽缤纷的效果。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一件“晕绢提花锦裙”，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再于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的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这是考古第一次发现的“锦上添花”锦，精美异常。在同地8世纪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双云头锦鞋和一双锦袜。鞋里衬内绿、蓝、浅红三色施晕绢，这是目前所知唐代最绚丽的一件晕绢作品。唐代，四川仍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区，在汉代久负盛名的蜀锦，这一时期有不少珍品问世。

遗存至今的唐代丝织品，有早期出土的“天蓝地牡丹锦”、“沉香地瑞鹿团花绢”、“茶色地花树对平绢”、“宝蓝地小花瑞锦”、“银红地鸟含花锦”等多种。

近年出土的有“兽头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吉字对鸟纹锦”、“棋纹锦”及“花鸟纹锦”，“瑞花遍地锦”、“龟背纹锦”、“花鸟纹锦”等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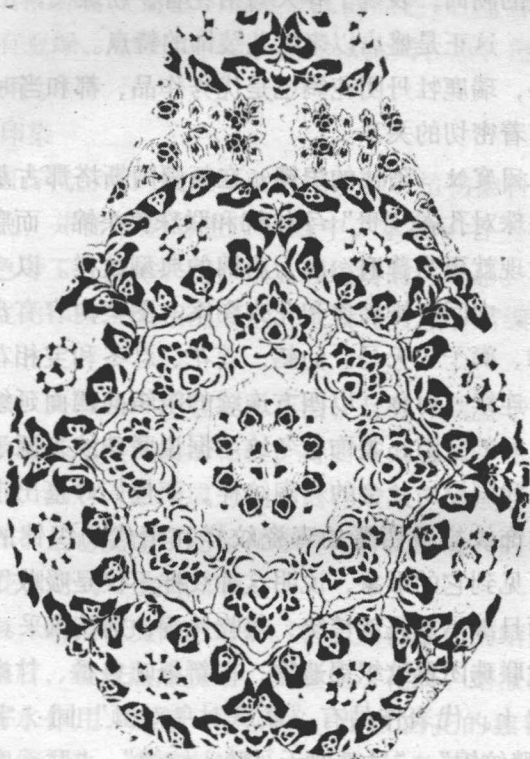
大量唐代精美的丝织物的出土，反映了唐代织造工艺的高度水平和精湛技艺。

唐代丝织品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其中以花鸟禽兽纹为主要的装饰题材。鸟兽成双，左右对称，鸟语花香，花团锦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按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种：

花卉植物纹 有盛开的牡丹花、折枝花、宝相花、散点花和卷草纹，形象处理的十分饱满生动，“花鸟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以盛开的牡丹花为中心，周围有展翅飞翔的蜂蝶和练鹊，有迎花飞舞的鹦鹉，有宁静的山岳和飞荡的祥云，疏密有致，花鸟争春。锦边配上蓝地花卉二方连续的装饰带，色彩华丽，制作精美，代表了唐锦的工艺水平和装饰特点。

“天蓝地牡丹锦”（故宫博物院收藏），此锦是琵琶锦囊的一部分。它主体纹样是一个正面形的8瓣牡丹花，周围用8朵侧面的牡丹花围绕而成。外面一层又装饰了一圈较大的牡丹花，花之间安排小折枝花，。构成了极其富丽饱满的大团花图案。在鲜艳夺目的天蓝地色上，花卉用深绿、浅绿、红、粉紫、浅黄等颜色来交错使用，用退晕手法来处理，使作品色彩华丽，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生机盎然。

陵阳公样 这类图案是唐锦中最为精美的一部分。主体纹样有鸳鸯、孔雀、鸡、鸭、羊、鹿、狮、天马、骆驼等。纹样成双成对，图案新颖奇丽，别具一格，被称为“陵阳公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窦师纶官至益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绦、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窦师纶是唐初派往四川主



牡丹纹锦囊（唐）

管皇室织物的官员，封爵“陵阳公”，他设计的织锦图案，凡鸡、羊、龙、凤等题材都采用对称形式，当时人们把这类花纹称为“陵阳公样”。一直受到人民的喜爱。“茶色地牡丹花对羊绸”（故宫收藏），主题纹样是迎着朝霞怒放的牡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露水珠晶莹闪光，美丽活泼的蝴蝶围绕着牡丹翩翩起舞，2只左右对称的小羊回首互望，一幅

恬静优美的画面，表现了春天鸟语花香、粉蝶飞舞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盛唐以来工艺装饰的特点。

此外，瑞鹿牡丹团花绸也是优秀作品，都和当时花鸟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联珠团窠纹 隋代的织锦，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中就曾出土过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和联珠兽头锦。而唐代这类图案的发现就更为普遍，成为唐锦的典型纹样。以一圈联珠组成团窠，中间安排鸟兽和花卉图案。图案内容有盘龙、凤凰、麒麟、狮子、天马、仙鹤、莲花、忍冬和宝相花等。纹样规整、连续、对称，以四方连续的组织向四面延续。四个团窠纹之间的空隙，装饰忍冬纹。据说联珠纹来源于古代波斯，但从我国原始社会的彩陶纹样，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铜镜背面的边饰纹样及西晋的青瓷纹样和隋代的织锦的联珠纹上，均可见到它的形象，说明这种纹样不仅是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

唐代联珠团窠纹织锦遗物，在新疆吐鲁番、甘肃境内都有大量出土。代表作品有“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天马骑士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戴胜鸾纹锦”等，尤其以鹿纹锦和猪头、对鸭纹锦，纹样别致，生动有趣。

此外，唐锦纹样还有几何纹，其中有双胜、万字、小散点花等。唐锦纹样形象华美、活泼，给后世深远影响。

唐锦色彩艳丽、明快，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唐锦作过色谱分析，色彩极为丰富。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黄有鹅黄、菊黄、杏黄、土黄、金黄等；青有蛋青、天

青、藏青、赤青（钳色、稍微带红的黑色）；蓝有翠蓝、宝蓝；绿有豆绿、叶绿、果绿、墨绿以及褐、黑、白等色，多达 20 余种。

2. 印染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利用矿物、植物染料对纺织物进行染色，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各类染料的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五彩缤纷的纺织品。

唐代的印染工艺相当发达，主要有夹缬、蜡缬、绞缬和碱印等。

夹缬 夹缬是一种直接印花法，起源并鼎盛于唐代。它是用两块雕镂相同花纹的花板，将要染的素帛夹在中间，涂以防染剂，然后入染，成为色地白花效果，染成后花纹左右对称。日本正仓院迄今还保存着唐代自我国输入的“花树对鹿”、“花树对鸟”夹缬屏风。

蜡缬 蜡缬即现代的蜡染。它是先将融化的蜡画在织物上，浸染后，经过热煮脱蜡，就显出了花纹。蜡液浸入纤维后，有防水作用，染液不能进入，形成白花的独特装饰效果。蜡染的方法，在西南的苗、布依等少数民族地区，仍广泛流行。蜡染花布图案生动别致，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远销国外，颇受欢迎。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象纹蜡缬屏风”和“羊纹屏风”，纹样十分精美。

绞缬 绞缬又称撮缬，出现在 5 世纪左右。方法是先将待染的织物根据需要花纹，按一定规格用线缝扎成十字形、方格形、条纹等形状，然后染色，染好后晒干，把线结折去。由于染液不能渗透，形成色地白花的效果。花纹边缘产